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〇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八期 ——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210c）

【史实辨误】	令人难以相信的贺捷生	余汝信
【史海钩沉】	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	胡学常
【一家之言】	“启蒙的文革”：一个造反派对革命理论与运动关系的辩说	谷 卿
【书刊评论】	《心路》对文革的反思有独到之处	唐 欣
【研究动态】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余汝信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实辨误】

令人难以相信的贺捷生

• 余汝信 •

一、原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

2012年8月31日下午，得知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全文如下：

关于贺捷生同志《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郑重声明

201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贺捷生同志题为《以女儿的名义》一文。该文第5段描绘了徐、叶两位老帅在徐帅家中会面并交换了有关长征途中张国焘那封“密电”的意见。作为长期在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经过认真回忆，仔细核查，证实“文化大革命”后直至叶帅逝世，叶帅从未到过徐帅家。徐、叶两位老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声明指向的，是官方人民网登载的贺捷生《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这段话：

记忆最深的那次是在他家里。当时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作者，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叶帅离开后，徐帅留下我，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啊，我们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说，我都记住了。他又说：“我和叶帅都是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搞不清楚，后人就更搞不清楚了。我们搞清历史，不是为了去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贺捷生的文章，发表于今年一月。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值得研究者重视。

从现有资料来看，贺捷生所谓两位元帅对密电“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的说法，确实令人产生严重怀疑。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贺捷生文中的“老伴”，据贺称两帅交换意见时“始终在现场”的李振军。

众所周知，1967年2月后被视为“二月逆流”干将的叶剑英，1969年10月至翌年7月在中苏关系紧张时，在中央统一安排下被疏散至湖南长沙、湘潭等地。时任驻湘陆军第47军排名第一的副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李振军，与其他同志一道，对叶剑英的生活尽其所能给予照顾，使其得以克服生活和疾病等方面的一些困难。李振军雪中送炭，使叶深有感触。

47军北调后，李振军留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1978年，丧妻后的李振军经邓颖超、帅孟奇介绍，与曾经两度离异的贺捷生结合。

我们不知道李振军后来如何评价他与贺捷生的这一段婚姻。据贺捷生后来对人说，李振军“他大我十多岁，但是当时瞒着岁数，他说比我大八岁，我也相信了。”贺的说法，外人听起来怎么都有点不太厚道。李振军出生于1920年，1937年入党，1965年45岁时任陆军第47军副政委。按此算来，李十七岁入党，如再隐瞒几岁年龄，李入党时岂不是儿童？如果李以减少党龄以求年龄造假，他如何向贺解释，在论资排辈的军队里怎么能担任当时省军级的职位？贺非农村妇女，李振军的资历职务，她不会掉以轻心，怎能骗得过去？

二、两帅协议一事，真的没有

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并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他渡过一段困难岁月的李振军。1979年12月，李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随后，担任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组长。

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任职，也就三年半的时间。1983年3月，他调至重新组建的武警部队，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这是后话。因贺捷生称事情是发生在李振军在军科负责《叶剑英传》编写工作时期，可以推断，她指的只有是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

此一时间段。惟李振军在军科期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记载他参加过什么两帅相约当面交换关于“密电”的意见一事（另据了解，李振军在军科任职期间，贺捷生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基建工程兵报》工作，此期间，她既非与李一同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更非该项目的负责人）。今天，原叶办工作人员更坚称所谓两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恰恰相反，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是，在李振军负责叶剑英传记组工作期间，叶剑英曾经同军科有关负责人和传记组人员多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了长征，更重点地、详细地谈及了获取“密电”的经过：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以上写入军科所编《叶剑英传》及《叶剑英年谱》的叶在1981年至82年间的谈话，是我们否定当年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此其一。

1995年出版、由军科《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写的《叶剑英传》，更对“密电”前后详情作了交代，此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二：

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199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正式出版的《徐向前传》，从另一角度详细叙述了此一“公案”尤其是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

与此同时，即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陈昌浩将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10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这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徐向前传》及徐向前本人的有关叙述，可视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三。

本文原准备评述“密电”问题，但为了批驳贺捷生有关两帅“协议”的谬言，不得不详加引述以上叙述。由此可见，关于这段“公案”，叶、徐两人在1980年代以后都是各自详细表述的，并没有什么“宜粗不宜细”。

此外，更重要的是，《叶剑英传》后记中提及：“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百科研究部）领导莫阳、郭树元、贺捷生等先后分管传记编写工作，尤其是贺捷生重视组织领导，帮助解决困难，作了大量工作。”《叶剑英年谱》后记中称：“原军事百科研究部的贺捷生……，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面对两书中大量关于“密电”的文字，据了解，贺捷生当年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可见，所谓“宜粗不宜细”的两帅协议，是贺捷生在李振军去世后，今年初才杜撰出来的谎言。

贺捷生杜撰这段谎言的目的，外人不好猜度。但她自称是徐向前的“女儿”甚至是除林彪之外九位元帅的“女儿”，“以女儿的名义”杜撰此事，至少是对叶帅的不敬！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叶帅外出不可能孤身一人，此为常识。对贺文所说的两帅“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更没有一个人随叶去现场。贺捷生却对根本没有的事说成自己“始终在现场”，甚至说两位元帅“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绘声绘色地、无中生有地把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说成仿佛在做一笔政治交易，这种丧失中共党性原则之事，两位老帅断不会为。贺以“元帅女儿”身份，将此不实之词强加于两位元帅身上，到底意欲何为？！

三、揭发父亲这事，真的有

我们说贺捷生难以相信，还有她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时的一些话。

据报载：

昨天，贺捷生在发言时，哽咽着给大家讲起自己的遭遇。“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突然贴出一张‘文革’中冒充我名义，写我父亲的大字报。”贺捷生说，当时她因受父亲牵连，根本没有写大字报的权利。“面对某些利用网络对我的诬陷，我束手无策，一直背着写我父亲大字报的黑锅。”贺捷生哽咽着说：“我已经成了老人，再也不愿意沉默下去。我敢以人格担保，那张所谓的大字报，完全是在伪造！”

同日的《南方都市报》写得更为详细：

针对这份网络上传的“大字报”，贺捷生回忆了当初的情形是：“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我正在总政治部主持编纂军事大百科全书。这时，网络上突然贴出一张‘文革’中冒充我名义写我父亲所谓的大字报，并注明‘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

贺捷生说：“虽然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实际情况是‘文革’一开始，我作为一个小单位的一名小干部，因受到我父亲贺龙冤案的牵连，被打成反对江青的‘反革命’，丈夫也被迫分离，二女儿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所以自杀了；自己在单位被监视居住，每天在专案组的呵斥下接受劳动改造。”说到这里，贺捷生哽咽无语，流下了眼泪。

稍后，贺捷生继续说：“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就没有写‘大字报’的权利，更没有上台批判我父亲的资格。直到‘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在平反结论上，还写着‘不能与家庭划清界限，属不可教育好的子女’。”

贺捷生最后说：“但几十年来，面对利用网络对我的诬陷，我诉讼无门，一直背着黑锅。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再也不愿意沉默下去，因此在这个严肃的场合，我敢以人格担保，所谓的‘大字报’完全是伪造的。”

事实绝非如贺捷生所言！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其实，很多人对贺捷生曾经揭发过她自己的父亲贺龙元帅，记忆犹新。的确，所谓揭发的“大字报”，并不是贺捷生本人亲自所写，但以大字报、或传单、或小报等多种形式流传的此一揭发材料，却千真万确是贺捷生本人所讲，别人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材料，明眼一看都很清楚：除了贺捷生这样与贺龙关系密切者，其他人编造不出来。

以《打倒军内反党篡军大头目贺龙（三）采访贺龙女儿贺捷生》为标题的揭发材料，最后署名是“总政文工团话剧团‘追穷寇’革命联合造反团”，落款日期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该材料全文约九千字，甚长，所以，又流传有许多字数不等的“缩写本”，贺捷生提到的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刊载的，只是缩写本的其中一种。

揭发材料开头便说：

四十年来贺龙一直是一个没有改造的大土匪，是一个反党篡军的三反分子。为了把这个反党的大野心家揪出来，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除掉埋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边的这颗定时炸弹，我们访问了贺龙前妻所生的女儿，贺捷生同志。

贺捷生同志生于长征前十八天，出生后便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寄养在农民家中。三反分子贺龙，前军阀部队中所结拜的兄弟，国民党旅长秦光远，团长瞿玉屏二匪，抱着升官发财的目

的，来到贺部。军委不同意贺龙将二人按插在贺部，并指示贺龙，秦、瞿二人如愿参加革命，必须先到抗大学习改造，再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贺龙对这一指示不满，对二匪说：“你们俩个回去吧，现在共产党里，我无权安排你们的工作。”并将贺捷生交与秦、瞿，二匪带到白区“教养”。由此便可看出，贺龙的反动本质。一、贺龙认为白区比解放区保险，二、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还可靠。

贺捷生到白区后，先后住在秦匪家，秦死后又到瞿家伺候瞿匪全家老小。直到解放初期，贺捷生亲生母亲，经过重重困难，才将贺捷生找回。三反分子贺龙得讯后，强行要去；并扬言说：“她是贺子贺孙，应回贺家。”后母薛明（贺龙现妻）对贺捷生倍加歧视，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贺、薛二人并限制与其亲生母亲通信。逼得贺捷生曾跳井自杀未遂。贺捷生曾想上告；贺龙知道后对贺捷生说：“你要告我吗？我在公安部挂号了，我在总理那挂号了，我也在毛主席那儿挂号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副总理，我是元帅，你这个小孩，小党员，告不倒我。让你姨与你妈，都去告我吧，她们也告不倒。要告的话，我就对她们不客气。”贺龙经常用这些话，来威胁贺捷生，使其有苦无处诉，敢怒不敢言。直到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贺捷生逐渐打消了顾虑，离开了贺家，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站出来揭发三反分子贺龙反党篡军的罪行。贺捷生表示：“谁敢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谁敢反对社会主义，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父亲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揭发批判这个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贺龙，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决打倒反党篡军分子贺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在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他学习过毛主席著作。经常见他手不离卷、赞不绝口、形影不离的书是：“七剑十三侠”、“小五义”、“罗成征西”、“说唐”、“老残游记”、“济公传”、“西游记”、“余赛花”……等武侠神怪小说。三反分子贺龙所到之处，都放着这些书，以便他随时翻阅，如床上、办公桌上，甚至在他的厕所里都摆着许多小人书供他消遣。三反分子贺龙经常在厕所里看小人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一天当我为此向他提意见时，薛明说：“你懂什么？大首长都是这样，这是第二办公室。”

有一次，不知怎么把“罗成征西”和“余赛花”这两本书丢了，于是三反分子贺龙就命令聂占薪（贺的看家狗，大管家）打电话询问全市所有的书店是否有这两本书。最后还给各旧书店打电话叮嘱说：“如果发现这两本书，赶快打电话告诉贺办。”

平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也进行土匪教育，他灌输给我们的是：“绿林好汉”“江湖义气”等封建阶级的反动思想。三反分子贺龙平时对我们的考试题中就有：“浪里白条是谁呀？”“穿山虎是那一个？”“闹东京的五鼠是那五鼠？”被考试的贺鹏飞目瞪口呆答不上来；站在一旁陪考的姐妹们提心吊胆不敢作声，知道的也不敢提词。

贺捷生同志接着说：三反分子贺龙把这些宣扬封建鬼怪的小说视如珍宝，奉若神明，他可以把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及一些现代革命小说随意丢在地是，堆在字纸箩旁；可是，对黑帮分子邓拓的“燕山夜话”却当成珍品，加倍爱护，整齐的摆在玻璃书橱内供人欣赏。

三反分子贺龙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让我们学。一次他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在学毛主席著作”。他不满地说：“你在宣传部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老党员要好好看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请教。

另一次他还对我说：“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亏，脾气不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么！”

六六年我去大连养病前，贺问我都带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带了毛选四卷和主席语录，准备读一读”。贺却强调说：“你应带《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应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不学怎么能行呢？”

有一天三反分子教训我说：你们要忍耐，好汉不吃眼前亏。

.....

在“大土匪头子贺龙，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薛明与贺龙结婚是彭真的大媒，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丑事。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勾勾搭搭更是由来已久。贺捷生同志揭发：“我母亲在延安”时，就对贺龙说过：不要与彭真拉拉扯扯。贺龙对此，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些话告诉了彭真。可见他们之间的反党活动并非今天才开始的。贺龙与彭真开会经常坐在一起，散会又同乘一车回来。贺常把钓来的大鱼送给彭，这绝非生活小节。

贺捷生同志揭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贺龙曾对我谈起，彭真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虽是高小生能文能武。”并且说：“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之类的话。

当“三家村”黑幕被揭出来之后，有一次贺问我（捷生）“文件你看过了没有？”并十分痛心的说：“二十多年的老相识，没有看透他，使人不明……。”革命的同志们！谁能相信三反分子贺龙的鬼话呢？！难道他真没有看透彭真阴谋搞颠覆活动的本质吗？难道他是真的不明真相吗？不是的，他们是反党的黑伙伴，贺龙所惋惜所痛心的并非是二十多年的相识彭真欺骗了他，他惋惜的是他的黑伙伴一个个的被揪了出来，他的变天美梦从此便成泡影，他惋惜的是自己的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等待他的是王朝末日即将到来。

63年整风开展了“洗手洗澡”运动，有一次薛问我（捷生）“你们那里也在搞整风吗？”我说：“正在搞整风”，薛明大为不满的说：“我们都作了检讨”，并且还说：“×××与×××也作了检讨”。薛明散布的这些言论露骨的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所提出的整风运动，这与黑帮头子彭真的“错误言论人人有分”同出一辙。

罗瑞卿与三反分子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贺捷生揭发：罗常到贺家去，有时常要电影带到贺家去放，一起看电影，谈笑风生，其感情之深是不难理解的。

罗对贺的讲话是逐字逐句的记录，但贺心中有鬼，怕罗泄露机密。贺捷生曾听见贺龙曾叫秘书何家为给罗的秘书打电话说：“来嘛，随便谈谈，不作什么指示，以后不必作记录了。”由此看出贺龙真是作贼心虚。

贺龙是个“黑武将”，吴晗是个“臭文人”，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贺与吴在一起打乔牌、争上游、钻桌子、钓鱼、打麻将，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吴晗写的书送给贺龙，他在书上恭恭敬敬的写上：敬爱的贺“元帅”、“总理”、“同志”请指正”。贺对此非常欣赏，其用心很明显，就是让吴晗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其阴谋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

贺捷生揭发：“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我见贺办的人用小汽车将大字报送致清华大学。并听

贺办有人讲：“要在小树林密密与贺鹏飞等人接头。”我问薛明：“小龙干什么？”薛说：“小龙忙的要命，他领导着好几千人在干，他是文革主任委员”。薛还得意的说：“我们不要给孩子划‘框框’，让他自己闯，就闯出来了。”薛明甚至还把许多重要的中央文件给贺鹏飞看。贺鹏飞此人喜欢篮球，贺龙语意双关地讲：“我是你们的领队，你妈妈是你们的政治指导员”。由此可见贺鹏飞等人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革命的同志们！贺鹏飞等一小撮反中央文革的小坏蛋，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言人、传声筒，是谭立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反动封建血统论的顽固执行者，他们企图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贺龙、薛明如此苦心孤诣地培养和支持这一伙反动家伙，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贺龙就是要把他们的后代培养成他们自己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妄想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世世代代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贺捷生揭发：“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揪出来后，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新市委的成立，报喜祝贺时，三反分子贺龙却感到大难临头，敲起了死亡的丧钟。在家中气愤愤的说：“烦死了，吵的我睡不着觉。”一句道破，贺龙这个大野心家，大土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

.....

在“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三反分子贺龙，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只要贺龙的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全体工作人员就顿时为他一人忙碌起来，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裳、穿袜子、穿鞋、系鞋带，医护人员急忙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他每餐的饮食都要保证一定的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处精密计数食物的含热量。）”

“他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还要老婆，秘书，警卫员，护士等人陪同。因怕冬天在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特将原来的走廊全都按上了大玻璃，专供冬季散步用。夏天，闲院太小，有时要到体育馆去散步；但又闲人多吵闹，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贺龙是从来不看文件的，重要文件就让秘书讲给他听，而且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他从不爱提笔写字，有时连签自己名字都不愿动手，因而经常家里人就代替他签名。（家里人都会仿他的字体。）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打麻将，打扑克，争上游输了站桌子。离开西南时，贺龙，邓小平特意把一个所谓打了一二十年的“台球专家”××调来北京，专门陪他们打台球消遣玩乐。”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喜玩猴子，还给猴儿吃香蕉吃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来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玩。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针，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鱼有肉。”同志们：堂堂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充满了感情，为此关怀备至，真是天下的奇闻，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大富翁，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最爱钓鱼，经常与罗瑞卿，彭真，廖汉生，吴晗一起钓鱼，一钓就是一天。在困难时期，一年内光买钓鱼票就花了五百元，还在家里专门修了一个养鱼池。还有人照管鱼池。他钓不着鱼回来，大伙就等着挨骂。他最爱借饭菜不可口而大骂炊事员，只有三个人他不敢骂，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的医生，他说：“医生是杀人不见血的。”在云南时，贺因钓不着鱼，便用手榴弹到河里去炸鱼，因为次数多了，引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登报批评了

他，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大骂群众。这是何等霸道！？

“贺龙这个三反分子，是个老跳舞迷，在西南时，特地找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来教舞。战斗剧社经常为了给他伴舞，连节目都要停排，如果稍加怠慢，就要骂人。当时西南剿匪任务很紧，他却要去云南休养，在休养期间特调了战斗文工团的两名女同志专门陪着他跳舞消遣，伴舞的唱片是‘拷红’、‘何日君在来’等黄色歌曲。

他吃了饭没事干，大捧旧戏子程砚秋。程砚秋化上装，按上小胡子，拍马的说：“贺总，你看我化上妆多像你呀！将来我要在银幕上扮演你……”。贺听了之后昏昏然，十分欣赏。程又将其化妆的照片送给贺，上面写着：贺将军，您看我像您吗？您的小兵程砚秋。贺对程就更加赞赏大肆吹捧。

贺龙与陈播，董小吾，陈其通，严寄洲这些黑帮分子经常来往，互相吹捧，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借文人之笔为自己扬名。

三反分子贺龙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要避寒，夏天要避暑。在西南时，每到夏季便带着家属及随从人员去南温泉、北温泉、昆明、安宁温泉去避暑。在北京时期，他冬季上广州、四川，夏季到北戴河、青岛。

“贺龙与薛明睡觉时飞机从他屋顶飞过都不行，有一点声音他都要发脾气，并命令在他睡觉时不许飞机从他屋顶飞过。真真岂有此理，简直是恶霸土皇上。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贺捷生的揭发，涉及到很多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除父亲贺龙之外，还涉及到继母薛明、同父异母的弟弟贺鹏飞。给其父安上的罪名，除“三反分子”、“反党篡军分子”外，还有什么“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挥霍无度”，甚至是“恶霸土皇上”！

诚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象贺捷生此类揭发父辈之事，并非仅此一例。更著名者，是刘少奇前妻所生的女儿刘涛。此类伦常乖舛之事，在那一种特殊的政治高压气候和氛围之中，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四十多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唯贺捷生在其晚年并不以此为人生教训，反而不甘寂寞，主动挑起事端，不仅对自己早年的所为百般抵赖，还将网上的偶有议论定性为“境外敌对分子有意为之”！无论贺捷生所为是出自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都是万万不可原谅的一种愚蠢行为！试问，自文革迄今散落民间的文革小报，何止万万千千？你“净化”得完吗？你封杀得完吗？你“屏蔽”“删除”得完吗？你是否因为你曾经干过的蠢事，就非要在中国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才能安心？今天的中国，还会听你贺捷生的，再来一次“焚书坑儒”吗？！

（2012年9月）

~~~~~

【史海钩沉】

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

• 胡学常 •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是“文革”的一件大事。经典的“文革”叙事，一直把它视作“导火索”，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它讲起。但是，姚文元文章究竟如何出笼，尤其是毛与姚文的关系如何，几种常见的“文革史”，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未曾点透。像声誉甚好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在江青的“心怀鬼胎，秘密策划”上着墨较多，却对毛在其中的作用未予深究，只说毛“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另一种严家其的“文革史”，倒是着墨稍多，却仍是强化江青的作为，虽隐隐透露了毛的作用，最终却是未加点透。（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还是洋人有能力说实话，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新近面世的“文革史”，在首章劈头就说：“1965年2月24日；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15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

再看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它的“文革”部分，自然也是要述及姚文的出笼。不过，它有意不作过多的追究，只从姚文的发表说起，然后稍微回溯一笔，为文章的出笼做了结论。这个结论，倒是毫不含混：“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说得很清楚了，在姚文发表前夕，毛才见到文章，他仅是“同意发表”而已。此前的一切，似乎都是江青背着毛干下的勾当。

那么，做此结论的证据何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也是训练有素的史家，当然知晓要用史料说话。然而史料的选取，却是大有讲究。《毛泽东传》举了毛的一次谈话：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上）

此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在1967年2月3日。毛似乎谈得很坦率，把一些涉及党内高层斗争的秘辛都和盘托出。《毛泽东传》拿了如此好料，恰可证明前此做出的结论。

可是，还有一则史料，也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0页，编印者不具，1967）

这是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上引材料只标明在1967年，并未注明具体日期，且材料中出现的主要角色，以“××同志”示人，仿佛要保守机密似的。查网上流传的“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知时在1967年5月，而“××同志”，正是不难猜出的“江青同志”。

毛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同样谈得很坦率，涉及的高层斗争的秘事，两次谈话也大抵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毛自己与姚文炮制之关系。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毛说姚文的炮制，他基本上不知晓，是江青他们搞的，仅是“先告诉我要批评”。而后一次和军事代表团的谈话，毛说的却是“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这个差别未免太大了。前者毛是被动的，差不多是蒙在鼓里，直至姚文写成，他才知晓，才赞同发表，以作为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而后者，毛不惟主动，而且早已和江青密谋好了，江青他们不过是执行了毛的“战略部署”罢了。

作为史料，毛这一次谈话，并非难得一见。对专攻“文革”的人而言，它更是常见的史料。果真未见，而姚文的出笼又非同小可，则撰写“文革史”的资格和能力，势必成为问题。《毛泽东传》的作者，当不会出现资格和能力的问题，何况他们比一般研究者更加见多识广，说不曾见过此史料，无论如何是说过不去的。只是他们很有苦衷，如果选用此则史料作为证据，《毛泽东传》的那个结论便不能成立。而选取毛前一次谈话的史料则不然，既然姚文的炮制乃是江青背着毛的阴谋勾当，那么，毛尽管发动了“文革”，但他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江青的“蒙蔽”，甚至可以说被江青他们“利用”了。

同一件事，有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自史实鉴定的角度言之，哪种说法才是毛的真话，亦即历史的真相，尚需进一步的考证。那么，《毛泽东传》选取毛的前一次谈话作为史料，是否即是作者经由一番考证之后做出的取舍？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妨举出更多的史料，看一看在姚文炮制和出笼的整个过程中，毛究竟充任何种角色。

## 二

批《海瑞罢官》，其实早就在拟议之中。当初吴晗创作此剧，七易其稿，于1960年11月定稿，旋即开始彩排，翌年2月，由北京京剧团正式上演。1962年7月6日，江青观看《海瑞罢官》，立即指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停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第30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翻印者不具，1969年）江青所谓的“政治错误”，不外是该剧影射现实，配合彭德怀翻案。还有材料表明，她还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指出戏剧、电影界的严重问题。（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见《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海瑞罢官》的问题，即在那些“严重问题”之列。江青建议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被部长们婉拒。（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62年7月，周恩来根据江青的意见，找到吴晗，告诉他，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了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吴晗传》，第331页。《吴晗传》写作“1963年”，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当在1962年。第305页）1962年北戴河会议间，毛多次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已摸清风向，对毛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946页，红旗出版社，1999）

《海瑞罢官》公演不久，即有江青的发难，继而有柯庆施等的附和，连周恩来也惊动了。1962年夏，正值彭德怀上毛“八万言书”，一时空气紧张。在此政治形势下，过敏之辈认定该剧影射彭德怀罢官，也不能算太过离谱。关键是毛的想法和态度。《海瑞罢官》公演之初，毛是欣赏此剧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转见《吴晗传》，第325页）1962年夏，毛对《海瑞罢官》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客观呈现的态度上，毛并不主张对该剧

即刻进行批判。

毛似有更深远的谋划。实际上，毛是否认定《海瑞罢官》有影射之嫌，并不重要。日后赞成批判《海瑞罢官》，也并不意味着毛就真的认为吴晗在搞“罢官”影射。毛这样的人物搞政治斗争，考虑的是一切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十分讲究政治斗争的“章法”。众所周知，1962年夏秋间，是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捩点。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围绕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多次讲话和插话，重提阶级斗争，同时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议间的一次讲话中，毛忿忿道：“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8页，1967，编印者不具）毛此间的心迹，在这句话里已表露无遗。毛又一次抢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一洗“大跃进”失败以来两年多里的“灰头土脸”，开始了正式的反击。八、九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延续毛在北戴河时定下的思想基调，确立了一套“反复辟”或曰“反修防修”的“革命话语”。此话语稍作改良，“文革”期间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是指导“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所以，江青认为，“文革”的前奏，始于八届十中全会。（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98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反击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向吴晗进攻的时候。吴晗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其背后是北京市委，是敢干而坚毅的彭真。而彭真的背后是“接班人”刘少奇，除非到了和刘少奇摊牌的火候，吴晗万万动不得。江青早在一年前就放出来了，那就让她搞她擅长的“文化革命”，先在外围把火烧起来，烧出一种革命的气氛。

江青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刊发在1963年5月6日《文汇报》上。也就在1963年，鬼戏和香港电影停止演出。破中有立，这一年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上海方面，柯庆施竭力配合江青的“文化革命”，先是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继而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会。至1964年6、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以“文化革命”领导人的新形象，作了《谈京剧革命》报告。

此是第一轮大火。为了把火烧得更旺，毛密切配合江青，或讲话，或批示，锋芒所向，直指文化和宣传部门。毛念念不忘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说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毛甚至动了很大的气，威胁文化部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1月指示，见《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第64页，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等编，河北大学井冈山兵团独立大队翻印，1967）震动最大的，当是那两个著名的“批示”。此是毛惯用的“甩石头”招数。一个在1963年12月12日，以柯庆施的曲艺经验“批示”给“彭真、刘仁同志”，实是向北京甩出了“上海石头”。毛措辞严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36～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另一个在翌年6月27日，批示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斥责那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三

以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和毛的两个“批示”为标志，第一轮“文化革命”的大火业已烧至极致。接下来，“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64年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忽而危言耸听道：“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79页。日期原作“6月16日”，查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当是“6月8日”）大火进一步往上烧，眼看就要烧到最高层。8月1日，刘少奇在怀仁堂召集大会，发表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下去蹲点，不蹲点，不能做领导工作，“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第408页，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他越说气势越大，竟然说，“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同上，第413—414页）“开调查会”是毛倡导的方法，刘少奇犯了大忌。果然，刘作报告后，江青到毛处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73页，北星出版社，2001）8月20日，毛在北戴河同华北局李雪峰诸人谈话。李雪峰不赞成下发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也不同意刘少奇“四清”运动的做法。毛在谈话中大捧李雪峰，居然一改“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刘少奇”的一贯说法，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同上，第574页）

也就在从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毛指示把39个文艺材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就包括《海瑞罢官》，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又据王力回忆，此间毛拟定的“保护名单”里，可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和翦伯赞诸人，却不见吴晗的大名。（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9页）似可断定，从这时开始，毛下了决心，打算抛出《海瑞罢官》，将大火烧向吴晗及其北京市委。决计批判《海瑞罢官》，竟与毛刘冲突的公开化同一个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表明批判《海瑞罢官》在毛的“倒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据陈丕显回忆，江青曾告诉他，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开始物色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康生后来说过，1964年，他同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66年5月5日，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6页，新天出版社，1997）康生善于窥测风向，估计也是在此时，他领会了毛的战略意图，这才就《海瑞罢官》问题向毛进言。

待到日后姚文元文章发表，大火烧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烧及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毛这才对身边的人道出了“革命战略”，“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1页）由“剥笋政策”回思既往，批判《海瑞罢官》和“倒刘”之间的关系，便更为清楚了。

1964年9月，毛下发了《海瑞罢官》作为批判材料，可是，中宣部并不是积极执行，按照“文革”间的说法，“中宣部对这个重要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对三家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中宣部的做法可能不似这般严重，但“软顶”的情形会是有的。彭真自然也不赞同批吴晗，他反对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主张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江青就说过，“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甚至在北京，江青找不到撰写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写手”，她先找到昔日建过奇功的李希凡，李表示不能接受任务。（《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据毛曾对斯诺愤然道：“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斯诺同毛泽东谈话，1970年12月18日，载《漫长的革命》，第26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这样，在毛江的心目中，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中宣部也是“独立王国”。他们被迫“另辟蹊径”，采取“地方向北京造反”的模式，转而求助于上海。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支持下，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在炮制《海瑞罢官》的整个过程中，“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到了9月，文章大抵写就。此时，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出席的常委会议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之附件，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页，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毛名为询问，实则是“吹风”或“打招呼”，又仿佛是预作“伏笔”，将来回溯既往时，可以证明自己如何“光明正大”。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  
【一家之言】

“启蒙的文革”：一个造反派对革命理论与运动关系的辩说

• 谷 卿 •

这是一本我与作者的主要论点完全相异但仍以为是值得推荐的书。《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作者林伟然作为上世纪那场浩劫的亲身经历者与参与者，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文革直接引发了中国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而“文化大革命夭折的后果构成了中国未来最大的社会危机”。

这本对极权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提出直接挑战的专著是林伟然先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历史系随林毓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林伟然先生就因癌症病发去世，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译本是由作者遗孀李玉华女士所翻译的，除前言和译后记外，主要内容分为六章：作者首先介绍了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担当的特别角色，再将文革以前和文革早期、晚期及文革结束后等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论述，最终提出核心观点即文革是“一场流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林伟然先生在开篇就提出一系列问题，引出大家对文革本质的思考，然后明确地提出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讨论的焦点，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方面，而不是这一理论本身的起源和含义”。他否定了文革的起源和本质是权力之争的观点，否定了着重点放在派性斗争之上的研究方法，详细地分析了社会冲突理论的缺陷，指出存在分歧的派系的分野在于对权威思想理论的接受与否及程度大小。在林伟然先生看来，“由于不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社会冲突理论持有者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阶层出自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所进行的一场争斗”；“这场运动本身隐盖了它最重要的方面，思想理论的冲突和变化”。通过对文革前后及文革期间造反派和保守派队伍构成、指导思想、实际冲突等方面变化的分析，林伟然先生引出了其论著的主要观点：“权威的思想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根本的转变。这些转变在群众中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群众里受文化大革命前盛行的强调阶级划分思想理论影响最深的人，比较难于接受这些思想理论的新转变，从而成为保守派。群众中对重新定义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平等思想理论感兴趣的人，形成了当时的造反派。这样一来，在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形成的阶级阵线，也可以在不同偏向的思想理论里表现出来。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很明显地不是社会冲突，而是思想理论上的冲突。”

不得不说，林伟然先生的观察角度十分特别，他也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影响其至深的思想理论本质。他对于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敏感和关注使得他将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分出若干阶段，并声称直接把握住了这场运动的灵魂而非记载这一运动的实际经过。但是，在论述的过程中，林伟然先生显然过于强调了他关注的那一部分问题，而忽视了许多不该忽视的问题。

在第二章中，林伟然先生选取了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杂志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了阶级斗争理论在1956年以后被再度提上国家政治生活重要议题的必然性。在此，他对1956年到1957年间阶级斗争理论的变化和实际社会影响作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阶级斗争本来在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已经被认为基本结束，但由于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受到威胁（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转变要求领导核心或领导方式必须改变），他们遂再度抬出阶级斗争理论，于此寻求庇护。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意识形态的讨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共产党权力的增强本来就来自于思想意识形态而非法律和制度。但是，林伟然先生在这里将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视为一种对生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推动力：“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强化，为引用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阶级斗争理论在加强集体经济和支持独立经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教育，在中国能取得这些辉煌成就，使理想变为现实起了重要作用”。林伟然先生将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称之为“精神激励”经济，透过一系列的数值来臆想经济效益，为当时“超过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大唱赞歌，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以文革早期作为时间背景进行讨论的时候，林伟然先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内涵从思想到政治的过渡和转变，指出“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从思想意识形态战线转移到政治战线是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人们不再认为阶级斗争如他们在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所认识的，主要是精神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相反，人民被要求以真正的政治观点去看待阶级斗争。因而，在人民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实体，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种变化大大地强化了当时的政治气氛。”面对当时这样全民政治、生活政治化的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林伟然先生竟仍坚持认为文革起到的是“文化启蒙”的作用，更认为“毛泽东思想适应并成为了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引导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新解放”。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解放”只能是虚假和虚幻的：歌唱“从来没有救世主”，而言行又必遵毛主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放？

此外，林伟然先生将文革后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思想进行联系，认为在思想上这些运动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由此证明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与行为的启蒙性。显然这种推证方式是不妥的，立论基础也过于书面化和想象化。他还提出：“那些试图肯定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人，则从这场运动中发现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部分人所要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反官僚政治的方面，因而，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持了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在论著中遗憾地看到，林伟然先生总是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地认为支持和反对文革完全基于某种革命理论，甚至将文革这场运动的失败原因和“意义”完全归结于革命理论的接受和发展程度，而将目光和思维有意地从一些重大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基本常识上游移开来。比如第五章中提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正是造反派对官僚主义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打破了长期存在的，高度官僚主义和非民主的社会秩序。群众运动给官僚主义者应得的打击，同时也打破了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此处对“官僚主义”表现出了反感与仇恨，对造反派对之进行的冲击予以赞许，但事实上文革中也有许许多多生活工作均与“官僚主义”无涉的干部因为新阶级斗争理论的运动化而受到冲击和迫害，我们如何界定和判断官僚主义？谁具有界定和判断的权力？这都是当时的社会和作者没有考虑过的，审判者、裁定者和执行者身份的合法性总是被人们所忽视。从“启蒙”的本质上来说，则其必须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内涵存在，而文革作为一场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极大破坏作用的运动，丝毫不具有这些内涵，我们仅能从当时社会大潮的反对者和抵抗者的身上，看到些许理性与人性的光亮。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本名为“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专著竟然只字未提文革与文革时期文化状况的关系，似乎那些记录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实从未出现在作者的视域中。林伟然先生反复宣称暴力行为和武斗“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但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在事实上却直接使得文化传统产生巨大的颠覆和断裂：那种在来源上具有殖民性质的斗争的、革命的、破坏的思想意识形态自从建国之后就不断与本土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最终在全民暴力参与的情境下将精神、道德、思想、器物层面的文化资源全部摧毁殆尽。当代中国在后文革时期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断遭到这样或那样的失败，正是由于既乏向外借鉴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勇气，又无向内汲取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的能力，这才是文化大革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非像林伟然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于通过遗弃毛泽东思想而放弃了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希望。

在这本书正文前的彩页中，作者印上了一张自己手持红宝书站立于天安门广场前的旧照片，上面写着一行字：“献给我属于其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一代”。对于我父辈的这一代人而言，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无疑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命运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虽然他们同是“造反派一代”，但他们对文革的感情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作出最后的结论之前，林伟然先生或许是在用这样一段话来暗示自己之所以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一种阶级斗争理论，那就是引导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文化大革命也只有一种，那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流行的心态表明了大部分中国人从没有被新阶级斗争理论刺激过。”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思考与研究，林伟然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阶级斗争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思想理路，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文革本质的视角，这种发自本心和自然研究习惯的存异之说，理当引起我们超越于情感与成见之上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 原载《北斗网》

~~~~~

# 【书刊评论】

## 《心路》对文革的反思有独到之处

• 唐 欣 •

——在《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研讨会的发言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讨论。我觉得本书有三个长处。

首先，它把共和国的第三代作为一个“代际”的概念在学术上提出来，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目前新中国的第三代人即将掌控中国的政局，了解这一代人的代际特征，对观察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趋势，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老米从《红卫兵这一代》，到《聚焦红卫兵》，再到这本书，这个题目是越来越清楚了。另外，他对这一代人的研究，抓住了一个重心，就是反思文革。批判、回顾文革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在某些方面比其他的著作都更深刻。

第二个优点就是史论相结合。研究这两大课题（“共和国第三代”和“文化大革命”），老米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是用了当事人的回忆，有史，也有论。我觉得比起他的前两本书来，老米在现在这么厚的一本书中主要补充的是“论”的部分。原来那两本没有这么多论述。第一是论第

三代，他提出了一些定义、概念。第二是论文化革命。我看了他这本书，感触最深的是他引用当事人的回忆，谈到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学生运动的影响。文化革命的时候我都大学三年级了，不属于你们老三届。我当时就感觉北京的中学生怎么就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提出来，而且还要如此激动地辩论呢？我看了那么多的书都没有明白，老米这本书讲明白了。你想在中学里面讲阶级斗争，怎么斗争？都是未成年的学生，不一样的就是家庭出身了。所以，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学生中推导出来了血统论。老米把问题的根子挖出来了。直接挖到了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上。

第三个优点，我觉得老米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有独到的值得一提的地方。他的反思，是站在第三代人整体的角度上阐述的。他指出：这一代人，通过文革初期疯狂的投入革命，到上山下乡插队的经历，在文革十年中认识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明白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当年所奉行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中产生的巨大灾难。这一代人亲身融入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中，和广大农民一起，实践了贫困和饥饿的生活。从一代人的整体上，产生了“告别乌托邦”的觉悟。第二个是，这些由革命理想支撑的、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第三代人，在极为贫困的生活之中，终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告别了“集体主义至上”的思想，开始考虑个人的实际利益，终于重视了“个人的价值”，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这种告别“乌托邦”；告别“集体主义至上”的觉悟，是文革十年中，第三代人整体反思的结果，是集体的觉悟。这两个觉悟，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奠定了一代人自觉适应改革的潮流的社会基础。

另外，我讲讲不足之处。

一是在本书251页中说的一司总指挥的姓名、性别都错了。实际上，这位总指挥叫汪月琴，是汪东兴同志的女儿，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可见老米对大学生较陌生。老米既然要研究一代人，那么文革中仍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与这一代的关系，就该考虑。老米的书谈到了大学红卫兵“三司”对“4.3派”的支持，及其对中学“4.3派”发展的意义。是否也应该提一下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对中学老红卫兵运动的影响？老米既然要研究一代人，就别把这些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给忘了。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时仍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上山下乡，他们在“告别乌托邦”和“告别集体主义至上”上，与老米分析的“老三届”有不同之处。这可能形成“老三届”执政风格与“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执政风格的差别。

二是从全书整体情况来看，上山下乡是书里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在前头引用口述历史讲述者的讲述内容时，底下都有注释，说明是谁讲的。可是到上山下乡部分忽然间很多讲述内容的出处没有了。这从历史学著作的严肃性上讲，是一个漏洞，应该补注上。

再有，我想提一个问题。第三代人当中的老红卫兵，主要指干部子弟，是不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因为最先反对“中央文革”，就可以说他们在这一代人，或全国人民当中，是最先觉醒的一批人呢？从王年一先生研究文革起，就有这样的说法：谭力夫讲话，老红卫兵六冲公安部，联动反对“中央文革”，表明他们是文革中最先觉醒的一批人。一直到现在一些老红卫兵反思文革的时候仍然很自豪地说他们是文化革命中第一批觉醒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看见有些现在正掌权的人，似乎也觉得他们早就觉悟了，早就告别了文化革命了。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存在的很多深层次问题的。

干部子弟在1966年10月份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和“中央文革”对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反对反当权派，而且是反对反大当权派。小当权派是他们带头反的，反校长、反老师。那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的。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是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文革”批判老干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红卫兵不服气。坚信他们

的父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污蔑他们的父辈，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们的父辈，是反毛泽东、反党的行为。他们自认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此他们才敢和“中央文革”这批“奸臣”叫板。他们当初在反“中央文革”时，对他们父辈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罪行，即“三自一包”和“三合一少”的做法，也并不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父辈是坚持“三面红旗”路线的。只是当他们和“4.3派”、“4.4派”一起在下乡后，看到农民的贫困，自己也和农民一起受穷后，他们才对毛泽东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有了批判，开始觉醒。而这种觉醒，是整整一代人一起觉醒的，不分先后。至于文革中，“中央文革”是听毛泽东的，还是反毛泽东的问题，至今我们的党也没说清楚。

我认为文化革命可以分成错误和失败两部分来分析评价。

文化革命错误的部分是：要全党、全国人民坚持走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造成了浩劫。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模式）不是“乌托邦”，是“举国体制”，即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团结得如一个人一样的共产党的指挥之下“干大事”，以赶超的速度完成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使原本贫穷、落后的农业、半农业国迅速强大起来。它是落后国家完成工业化道路的一种现实的选择。斯大林模式经历史的考验证明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至少它不是“乌托邦”。而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为指标的社会主义，那才是“乌托邦”。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哪个都没提消灭私有制。他们否定摩莱里和马布立的“直接共产主义”。摩莱里们是要回到原始公社制的。圣西门等认为应该向大生产方向前进。他们肯定资本家、银行家在指导大生产方面的功绩。他们要求的只是废止继承权，保证资本的支配权永远掌握在善于对生产进行管理的人手中。马克思则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依据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认为，社会化大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生产要求更高程度的社会化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就成了生产社会化的阻力。因此，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而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力才能大发展；公有程度越高，才能促进生产的社会化。马克思的逻辑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求消灭私有制；毛泽东的逻辑是，消灭私有制生产力才能发展。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泽东不但自己坚持“乌托邦”的原则，还要把结合实践为发展生产力采取正确的“三自一包”做法的党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这种错误导致了一场浩劫。

文化革命失败的教训部分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快要夺取全国政权时，就一直关心一个大问题，怎样防止共产党执政以后脱离人民群众，当官做老爷。“房子越住越大，汽车越坐越小”，最终蜕化成为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官僚分子。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只是应该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本书里写得很清楚，就是“新4.3派宣言”（见《心路》一书279页、280页）中宣称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理论。实际上这是托洛斯基最先提出的无产阶级再次革命重新夺回权力的理论。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出发点就类似于托洛茨基的这种理论。“新4.3派宣言”把它挑明了。干部子弟觉得你要重新分配原本属于我们的权利？！没门！所以就对立起来了。其实“新4.3派宣言”提出了解决“公权力”如何不背叛人民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文化革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高表现，但是失败了，就证明用文化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提的并不错。这个问题现在左、中、右派全提出来了。“公权力”现在是上下一体的腐败，而且还解决不了。这不就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提到的问题吗？但是用文化革命时“阶级斗争”和“群众夺权”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认识到问题提出的正确性，承认用文革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才能迫使我们结合今天腐败的实际现象，另辟蹊径考虑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是以为自己早在1966年10月就觉醒了，只能是固步自封，妨碍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

□ 原载《共识网》

~~~~~  
【研究动态】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 余汝信 •

本书的缘起，出自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提议。

香港本身，是一本难以读得懂的书。笔者旅居此间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未敢说读懂了其中百分之一二。笔者更深知对1967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做一公正描述之不易，更遑论做出评价！十个香港人，或许就有十种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又是相互对立抵牾，不可调和。正如有人称之为“反英抗暴”，有人称之为“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左派骚乱”，更有人称之为“港式文化大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唯笔者乐意接受这一可能失败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毕竟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多少对这一段历史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本着对历史学的偏爱，亦有意试图做一次基础性的史实重建工作，借此机会，以还原其本来面目，澄清或更正一些对此段历史的误传误读。

未可否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少学者，以往已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一定深度的探讨，亦有了不少成果。唯由于对史实缺乏认真的查证，内地学者通常会犯对这段历史描述部分失实的错误。

如上世纪末作为汕头大学人文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称1967年8月港英政府“又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中国方面也采取强硬的反措施，7月以间谍罪名软禁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页378）我们知道，1967年8月港英政府查封的是《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外围左报。7月限制格雷行动自由，是对港英政府判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等举动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使用“间谍罪名”。而且，限制格雷自由一事在前，查封三报事件在后，前者如何能成为后者的“反措施”？

又如，2006年出版、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之一的《百年中英关系》，重复了《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错误，称“中国方面则以间谍罪软禁了路透社驻京记者格雷”，“8月，港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王为民主编：《百年中英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260）

再如，内地有出版物称，“8月20日后，斗争升级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部愤怒谴责港英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在72小时之内撤消对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8月23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指挥下，北京红卫兵和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同时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火烧了代办处，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页61—62）以上这段话，有三处史实错误：一、外交部当时提出的期限是48小时，不是72小时；二、发生火烧英代办处的时间为8月22日晚，不是23日；三、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与外交部造反派并无关系。

香港本地的出版物，则往往由于对内地的情况了解有限，或忽略了内地政策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地偏离了史实。

如霍英东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主政中国军务的林彪，已经下令派出两个师的兵力进驻

香港，当部队进入沙头角，准备进入香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紧急要求撤兵。”（霍英东口述，冷夏整理 / 执笔：《世纪回眸 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6月版，页122）这是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关系与决策过程严重演义化了。切莫忘记，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还是毛泽东，林彪只是副主席。如此规模的军队调动尤其涉外军事行动，毛泽东是牢牢紧抓在手不放的，当时，绝不可能有未经毛允许林彪私调兵力进驻香港的事情发生。

即便是当时港澳工委的某些负责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有不少并非实事求是的套话。如《香港六七暴动内情》的作者张家伟在访问前港澳工委常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梁上苑时，梁称，“中央的政策本来很明确，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当年的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却对香港工作常加干扰，他们也掌握了一些舆论阵地，例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又说，“林彪集团和港澳工委就此钻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结果便产生无人负责也不能追究责任的局面。”（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9月版，页269）笔者认为，目前并无林彪曾对香港工作加以“干扰”的任何证据。“四人帮”在当时则远未形成（“四人帮”形成应为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更无从“干扰”。而且，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经过周恩来的审阅，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的社论，就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形成，首要负责的应是毛泽东。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

有鉴于以上种种，1967年5至8月间香港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史实重建工作，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将史实重建的原料，分为香港与内地两大部分。

香港部份，主要依靠的是香港中央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报章缩微资料。这些报章，涉及到1967年这一时期的，有以下七种：《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是著名左报（当时的左报还有《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但今天已难寻踪影），对左派的活动有详尽的报道。《明报》1959年由查良镛和沈宝新创办，强调客观和中立，文革期间，刊登大量文革消息，并对内地政局时有中肯评论。其余四份报章，被视为右报，而且部分版面损毁严重，字迹多难以辨认。故而，本书大量引用了较为客观、中立的《明报》的报道和短评，涉及左派活动方面，引用的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道。少量引用了星岛报系及《华侨日报》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发现，《大公报》、《文汇报》在报道中通常是两报共用同一的新闻稿，本书引用了其中之一，即代表了两报的共同立场。同时，为公允起见，本书对于同一事件可能会引用左派报章和《明报》观点、角度不同的报道，以资读者鉴别。

内地部分，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主要还有：已公开的部分档案材料；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所提供的“反英抗暴”有关问题的材料；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的吴荻舟个人材料，等等。相信内中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对还原历史真相应有所裨益。

香港与内地两部分原料，对于史实重建来说同等重要。两者之间是密切不可分的，缺一不可。从份量来说，本书香港方面的材料会多一些，事件毕竟是发生在香港。内地材料相对较少，但尽量做到少而精，有时一份报告，则能说明很多问题。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未能扩展收集更多的原材料。唯笔者认为，目前所能展现的这一部分事件发生当时所形成的材料，已基本可以重组1967年5至8月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

起因、过程与结局。

本书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材料本身是客观存在，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因人而异，笔者的评论，仅为一家之言，欢迎识者批评指正。

感谢蓝真、萧滋、吴辉、马海甸、陈博文等前辈、友人以及天地图书公司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2012年6月于香港）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